用光影致敬伟大的战略决战

■张 弢 邢濒鹤

20世纪90年代初，一部总时长近11小时的系列影片在全国公映，迅速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标志性作品，该片以纪实与史诗结合的影像手法，系统展现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核心进程，通过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的艺术再现，传递出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这就是影片《大决战》。

历史上的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建立起较强的炮兵和工兵部队，提高了攻坚能力，积累了打阵地战的经验。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支援配合，已没有完整战线。事实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党中央科学分析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拉开战幕，经过52天激战，东北全境宣告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以60万人对阵80万国民党军，历时66天，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解放。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华北全境基本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分析全国军事形势时指出：三大战役之后，就军事上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打倒了。

经过战略决战，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解放区内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人力、物力、财力的基础更加雄厚。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持续大规模作战中积累了大兵团作战和诸兵种协同的实战经验，部队正规化建设也随之迈出重要一步。

精益求精的剧本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界、军史界长期希望以艺术形式展现三大战役，将其拍摄成电影，在银幕上再现这场气势恢宏的人民战争。这是三大战役亲历者和全军指战员的共同愿望，也是许多电影工作者长期筹划的创作计划。由于多方面条件限制，拍摄工作一直未能列入实施日程。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拍摄三大战役影片的条件逐步成熟。1986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将三大战役拍成故事片。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八一电影制片厂。







图①：《大决战》电影海报。
图②：在辽沈战役中，当地群众组成担架队，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
图③：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入天津市区。

为尽可能重现三大战役的历史原貌，《大决战》剧本创作组成立后的首要工作，是邀请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的专家为所有参与创作、摄制的人员系统授课。

在剧本创作阶段，编剧们系统学习党史、军史，查阅了几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大决战》的文献参考资料主要是当年的作战电报，仅三大战役相关的重要作战电报就有3000余封。创作过程中，他们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五大书记传记编写相关同志的协助，同时查阅了国内和海外出版的各类回忆录，参阅了当时在华外国记者所著的《中国的高潮》《中国震撼世界》等书籍。此外，编剧们先后深入三大战役的主要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大量史料和实物图片，尽可能寻访参战人员，了解他们在战役不同阶段的活动情况与性格特点，先后采访战役参加者和相关人士300余人，还登门向许多经历过三大战役的老同志、老战士请教，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字斟句酌地开展写作。

1988年1月，在全国政协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剧本创作组邀请当年担任国民党方面高级将领的政协委员，就已完成的第5稿剧本进行座谈。参会人员普遍认为，剧本反映的重大史实符合历史原貌，同时也对部分细节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之后，剧本创作组根据这些意见对文稿进行修改完善。

同年2月25日至3月2日，剧本审议小组召开全体会议，评审经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初步审定的第5稿。受邀参会的老同志多为当年亲历三大战役的各野战军指挥员、文艺工作者，以及曾在西柏坡总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同志。会议肯定了剧本质量，同时提出进一步深化修改意见，明确要求剧本精益求精，经进一步加工后再报审。

此后，剧本创作组耗时近一年反复打磨，至1988年底完成第3次修改。1986年1月创作组成立以来，3年间剧本共完成8次重要修订；即便影片开拍后，剧本仍持续优化，不少经典段落都是边拍边改逐步完善的。

重现人民战争的实践

《大决战》的全程拍摄，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关怀支持下，依托全国、全军的协同配合推进完成的。

1989年1月5日，《大决战》影片拍摄工作正式进入筹备阶段。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发文，宣布成立《大决战》影片摄制领导小组和顾问委员会。各有关省市、军区随后逐级组建对应的摄制领导小组，调集力量协助摄制组开展工作，为拍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当时，影片拍摄处于胶片时代，没有数字特效合成手段，大量战争场景只能靠真人实景完成拍摄。为复刻当年的战场情景，摄制人员、参拍部队和群众演员沿着当年三大战役的足迹辗转取景。影片先后有850余名演员参与拍摄，其中有名有姓的角色达238人，涵盖近50位重要历史人物，其参与规模、覆盖范围、人力物力投入量和拍摄难度，在当时国内电影创作中都是空前的。

在历时两年多的拍摄过程中，5个军区所属的陆海空军及武警部队中，共有25个军级单位、33个独立师团单位先后出动13.6万名干部战士参与摄制，动用了大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车辆等军事装备，累计参与拍摄的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总数达345万余人，真正践行了“以打人民战争的方式重现人民战争”的创作思路。片中多处万人级别的宏大战争场面，全部采用直升机航拍完成，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呈现出三大战役排山倒海的恢宏气势，成为当时国内战争片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段落。

这份“人民拍人民战争”的生动实践，在《大决战之淮海战役》的支前戏份拍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段戏份在江苏宿迁完成拍摄，当地接到任务后，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领工作人员进驻拍摄现场。当地群众参与热情极高，他们自带独轮车、太平车、老黄牛，自备粮食和铺盖，年龄小的十几岁、年长的七十多岁，主动住进庄稼地配合拍摄。大家都盼着像当年群众支援前线那样，亲身参与影片创作，以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支前历史。这份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既让摄制组深受触动，也为影片真实还原支前历史提供了生动扎实的支撑。

史诗品格的叙事探索

《大决战》的创作定位是“文献性史诗性故事片”，整部影片以历史实事为坚实创作基础，核心任务是艺术化地再现三大战役，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叙事探索路径。

从敌我双方统帅部的战略博弈等重大事件呈现，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完整发展过程展现，影片严格遵循历史事实，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果。影片既着力塑造我军革命领袖和杰出将领的形象，也以细致的镜头语言刻画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留下了不少令观众印象深刻的经典桥段。

兼顾纪实与写意的史诗风格，是《大决战》最鲜明的创作特色。《淮海战役》中有一段经典的平行剪辑重场戏，围绕淮海战役敌我兵力80万对60万的态势展开：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作战会议室里的蒋介石说“无论怎么讲，会战兵力是80万对60万，优势在我”，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里的毛泽东则回应“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这种蒙太奇手法既直观展现了双方战略层面的指挥对抗，也生动体现了不同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影片的导演、摄影、美术等创作部门，紧扣战史细节，结合不同战役的地域特点，着力塑造每场大战小战的独特气质：辽沈战役时正值大雪过后，整体色调以白色为主；淮海战役重点呈现水网地带作战的特点，表现敌军坦克对我军阵地的威胁，以及播送、投放《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相关历史场景；平津战役则围绕“围而不打”的作战方针，展现官兵与风沙搏斗的艰苦环境，通过提前告知观众30个小时打下天津的情节，强化作战任务推进的紧张感与戏剧性。

1991年8月1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4周年，《大决战》系列影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影片在全国公映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在海外也产生了积极反响。1992年1月，《大决战》荣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最佳剪辑、最佳道具等6项大奖。影片上映多年后，影响力依然持续。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主办方专场连续放映《大决战》系列影片，观众上座率仍达到80%以上。

机动穿插 突出重围

——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的乌蒙山回旋战

■张豫鄂 周 一

1936年2月初，红二、红六军团进入黔西，并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情况引起蒋介石的恐慌，他急忙调遣多支部队向附近地区集结，部署“围剿”作战，妄图把红二、红六军团消灭于此。2月27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共同研究认为，黔、大、毕地区已不具备建立稳定根据地的条件，决定退出此地，转向黔南安顺地区。当天，军团主力撤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开启近1个月的乌蒙山回旋战。

首战歼敌以则河

红二、红六军团从毕节撤出后，蒋介石迅速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多个纵队，由东向西展开追击。与此同时，四川军阀部队10余个团在金沙江沿岸布防，严防红军渡江北上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云南军阀孙渡纵队则在昭通、威宁地区防堵，既阻止红军深入云南，也提防蒋介石借“假途灭虢”之计，尾随红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按照原定计划，红二、红六军团准备沿毕节至威宁大道向西挺进，待将追兵主力调动至战场西侧后，再突然转兵向南，直插安顺地区。然而在3月4日，当军团进抵妈姑、回水塘地区时，侦察得知：国民党中央军1个纵队已进至水城、威宁之间，切断红军南进道路。军委分会立即召开会议研判局势，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此时直接南下安顺已无可能，只能先朝着乌蒙山北麓的彝良、镇雄一带进发，利用复杂的山地地形和红军擅长游击作战的优势，与敌人展开周旋，再寻找有利战机南下。

根据军团的决策，部队马上转兵北上，直奔奎香。敌军第28师抢攻心切、一路猛追，结果自己的位置逐渐孤立突出。3月8日，红二、红六军团见战机已现，便立刻派出红4、红16、红17师南下以则河一带，布设口袋阵，红5师则前出至恒底一带牵制其他敌人。次日清晨，敌第28师先头部队毫无防备地钻进红军的伏击圈。红17师率先发起攻击，各部随即协同开火，迅速将这股敌人全歼。敌军后续主力听到前方枪声大作，误以为陷入红军重兵包围，不敢贸然推进，只能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红二、红六军团抓住这一时机，火速撤离奎香，向滇东镇雄方向机动，拉开与追敌的距离。

转兵激战得章坝

红军突然向东，再次打乱敌人部署。蒋介石急电各路追击纵队加速东进，并令沿途民团、地主武装全力配合，为“围剿”行动提供支撑。红军东进的必经之路广德关，正由一股地主武装把守。敌人自恃关隘地势险要，将广德关称作黔西北的“南天门”，狂妄地认定红军根本不可能突破这道天险。

3月11日拂晓，担任前卫任务的红6师进抵广德关附近，在仔细勘察地形后，部队一面以部分兵力从正面发起佯攻，以吸引敌人注意；一面组织精干力量，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攀越悬崖绝壁，悄然迂回至敌人侧后方突然发起攻击。这股地主武装本就是乌合之众，忽见红军如神兵天降，军心大乱，惊慌逃窜。广德关遂被我军攻克。

3月12日，红二、红六军团继续向东推进，并在进军途中俘获两名敌军俘虏，供称万耀煌纵队正在经得章坝向镇雄开进。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掌握这一关键情报后，当即调整行军部署，派出红4师第11、第12团两个主力团，分别进至得章坝左右两侧，准备正面迎击万耀煌纵队，另外再抽出1个师的机动力量，对敌人进行侧击。

1小时后，两军就在得章坝附近接触。我左翼第11团2营突进敌人的警戒阵地，迅速消灭敌人2个连。右翼第12团冲进敌军司令部，敌纵队司令兼第13师师长万耀煌在溃乱中只身逃走。位于第11团左侧的红6师也对敌进行了猛烈攻击。正在行进中的敌人被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完全失去控制，乱作一团，四处溃散。此次战斗，红军俘敌200余人，毙伤敌营、连长以下12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7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300余挑。

我军凌厉的攻势让敌人惊慌失措，其主力或向后撤退，或驻止不前，红二、红六军团失去了扩大战果的机会。此后，敌军的行动更加谨慎，以多路纵队、分进合击的方式，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向我逼近，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关键时刻，军委分会一面命令部队丢掉一些驮担和重装备，一面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充分发挥红军善打近战、夜战的优势，采取敌进我进的方法，从两支“围剿”的纵队间隙快速穿插，向西北方向突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于3月16日第三次进入奎香地区。



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的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旧址。

南进到达滇黔边

红二、红六军团在跳出敌人包围圈之后，马上从昭通、威宁之间横穿而过，转兵东南，挺进滇东地区。而转战乌蒙山的行动，不仅让红二、红六军团彻底跳出敌人包围圈、甩掉了追兵，还在来往奔袭中频频打击敌人，极大挫伤了敌人的战斗信心和意志。各路参加“围剿”的敌军主力也被红军拖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基本失去继续追击的能力。

3月22日，部队到达宣威东北的来宾铺一带。贺龙、任弼时等人经过商议，决心改向滇黔边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获得必要的人员、物资补充，军团决心夺占宣威。然而，就在红军向宣威一带搜索前进之时，驻扎在此的云南军阀部队刘正富旅却主动出击，朝军团所在的来宾铺一带发起进攻。红二、红六军团将计就计，调集多个主力师向敌人发起猛攻，在重创对手之后果断撤出战斗、继续向南，并在3月28日进至滇黔边的盘县、亦资孔地区，逐步展开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从离开黔、大、毕，到转战乌蒙山，再到进抵滇黔边，红二、红六军团力克围追堵截的强敌和险恶的自然环境，创造了长征历史上的又一个经典战例。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转战，体现出我军指挥员高超的指挥领导能力，以及红军官兵坚决听党指挥的信念和勇猛顽强战斗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对此战高度赞誉，曾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中华兵典

《虎钤经》——谋先于战，变合于时

■颜嘉珞

《虎钤经》为北宋许洞编撰的兵书，全书共20卷210篇。书名中的“虎”即古代调兵所用的虎符，“钤”意为锁钥，合指执掌兵权者必备的“开启兵符锁钥之书”。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清《四库全书》本等多种传世版本。

全书以《孙子兵法》与唐代《太白阴经》为两大核心参照体系，融合宋代军事技术与传统兵学理论，采用分类编排、按类阐述的体例，汇集了大量与军事相关的天文、历法、计时、方位识别等知识，其中不少内容为前代兵书所罕有。许洞在自序中明确交代创作初衷：有感于《孙子兵法》义理精深，后学者难以直接通晓运用；唐代《太白阴经》的兵学内容又存在零散疏漏，因此他采前代兵学核心要义，结合天时人事的实际变化做通俗化推演，既祖述前人兵学智慧，也融入自身见解，内容选取不受传统经学框架束缚，始终以实用为核心导向。

作为北宋早期重要的私家兵学著作，《虎钤经》在继承前代兵学脉络的基础上，对古代兵学思想作出梳理与延伸。

首先，在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虎钤经》明确提出“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的判断，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置于战争要素的首要位置，确立了人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逻辑，所有料敌、用人、示形、造势、用间等战术设计，都围绕人的主导作用展开。针对唐宋军营中常见的依天象决断的风气，许洞在《三才应变》《三才随用》两篇中系统阐释天人关系，提出气象星象仅可作为决策参考，战争胜负最终取决于将帅的谋划能力与军队建设水平。他以《虎钤经》中“兵法如车之载其物，则车之转者由轮也，及有车之用，则东西南北者由人也”的经典喻理，打破将兵法教条化的认知误区。

其次，该书明确提出“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的理念，强调战场态势瞬息万变，绝不能陷入“胶柱鼓瑟”的僵化思维。许洞专门以“逆用古法”“逆用地形”为题，系统阐述了灵活调整战术，甚至反用常规兵法的实操思路，以此实现败势转胜、胜势巩固的作战目标。

在实战指导层面，《虎钤经》对古代兵法的概念和范畴有新的阐发。比如，《先胜》篇发挥《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提出“三和”“三有余”“三必行”的完整战前筹备体系；《袭虚》篇总结出“因势而动”“诱敌深入”两种袭虚战术；《夺恃》篇明确“夺强以气，夺隘以动，夺勇以威，夺缓以诱”的实操原则；《任势》篇则系统划分出乘势、气势等五种可利用的作战态势，以及挫势、支势等三类应当规避的败势。如此等等，是对《孙子兵法》等前代兵书思想的补充、完善与总结。

此外，书中还系统记载了攻守城战法、兵器械具以及水战、火攻等特种场景下的作战方法，汇集整理了大量古代阵法，许洞也自创了飞鹞、长虹等特色阵法，不少内容为同期其他兵书所罕有。书中还留存了宋代早期的火药相关配方、水陆作战战术与城防工事设计内容，附有“军器图”“阵图”百余幅，兼具理论性与实操性，对后世《武经总要》《守城录》等重要兵书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兵学传承脉络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文献。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8525572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57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地址同社址）